

社會投資政策的終結？

張英陣

壹、福利典範的轉移

過去幾十年來，歐洲福利國家面臨人口老化、撙節政策及各種社會和經濟危機的壓力。從1990年代開始，著重於訓練、教育、工作與家庭平衡、提升就業能力的社會投資政策，儼然成為歐盟國家面對這些挑戰的主要方法（Dräbing, 2013; Hemerijck, 2017）。

社會投資概念的起源可追溯至1930年代瑞典社會民主主義的福利國家發展，Tilton（1993）認為社會民主主義者主張社會政策是一種投資，而不是一種消費的成本。Midgley（1999）認為社會投資概念的起源蘊含於美國新政、凱因斯與貝佛里奇時代具有生產性要素的政策。Midgley與Sherraden（2009）則主張社會投資和1960年代興起的社會發展（social development）概念是一樣的，他們強調投資於人力資本、社會資本、成本效益計

畫、就業、個人與社區資產、去除參與經濟活動的障礙，就是一種社會投資取向。Esping-Andersen（1990）在分析福利體制時，認為瑞典的生產性或預防性社會政策強調應投資於成人的訓練與教育、就業、工作流動與家庭服務以擴大經濟參與，這也是一種社會投資策略。Giddens（1998）的第三條路具體提出社會投資的理念，他主張社會政策應該要超越左派與右派的爭議。Giddens認為政府應像企業家具備未來取向，將財政支出投資於人力資本是一種正向積極的福利，而民眾也應該是個冒險家。他指出終身教育以及政府扮演促進社會經濟的角色是引導社會投資最重要的策略。

2012年歐盟國家中，有16%的人口缺乏生活所必需的住宅、食物與衣物，而且超過24%的人口陷於貧窮與社會排除的風險。從2008年至2014年，家戶平均所得明顯下滑，這意味著歐洲的中產階級在生命

歷程中都可能陷入貧窮的風險。這些議題讓各國政府備感困擾，體會到漸進式的微小改革，已無法應付貧窮惡化問題。因此，社會投資觀點開始被認為是可以利用長期的觀點來解決基本問題的策略。社會投資的社會政策包含社會保險、所得維繫、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兒童及家庭政策、教育、老人及長期照顧和健康照顧等。社會投資觀點也強調運用多種政策工具，以提升人力資本，並促進人民的能力、參與社會和經濟生活（Natali, Vanhercke & Johnson, 2015）。自從2000年的里斯本策略（Lisbon Strategy），歐盟越來越重視教育與訓練政策（ET, education and training），這是歐洲知識經濟模式的主要構成要素，強調教育與訓練是人力資本的投資策略，是提升競爭力與促進經濟發展的生產性因素。因此，教育與訓練成為社會投資典範的核心議題，透過人力資本投資以促進勞動市場參與，並面對新的社會風險（Agostini & Natali, 2015）。

現在使用的社會投資概念主要來自1990年代的歐洲。然而，前面已提及社會投資的概念在1990年代以前就已產生，甚至開發中國家像是臺灣、南韓、新加坡早就有社會投資的政策（Hemerijck, 2017）。不過，近來最完整地建構社會投資政策應屬歐盟2013年所出版的〈社會投資方案〉（Social Investment Package），該方案倡議未來取向（future oriented）的

福利政策，藉由從兒童至老年投資人力資本與能力，好讓個人、家庭與社會「準備」（prepare）回應一個充滿競爭的知識經濟社會中之新社會風險，而不是在遭遇經濟不幸或個人危機之後才來「修補」（repair）不幸事件（Hemerijck, 2016）。Bruno Palier認為社會投資是一種理念的革命，取代了傳統以國家為本的社會政策，福利國家將從「護士」（nurse）照顧的角色走向「投資者」（investor）的角色（引自Saraceno, 2015）；或者說社會政策的新邏輯不再是一張「安全網」（safety net），而是「彈跳床」（trampoline）（Jenson, 2012）。Goodin等人（1999）也認為1945年以後的福利國家和1990年代興起的社會投資型國家在價值理念上確實有差異（引自Jenson, 2009）。傳統的福利國家與社會投資型國家均著重於經濟層面，但傳統的福利國家更重視平等的理念及消除貧窮，而社會投資型國家著重預防貧窮的代間循環及個人生命歷程的觀點，請參閱表1。

Giddens的社會投資理念是超越左派與右派的爭議，而當前歐盟的社會投資政策也企圖在傳統的凱恩斯福利國家和主流的新自由主義中找尋福利改革的出路。社會投資觀點在社會問題的分析與診斷、價值與原則、公共行動的方法、以及政策工具的運用都有別於凱因斯典範和新自由主義典範（參閱表2）。社會投資觀點在面對當

表 1 社會價值的比較

戰後福利國家的道德價值	社會投資型福利國家的價值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促進經濟效益 · 降低貧窮 · 促進社會平等 · 促進社會融合及避免社會排除 · 促進社會穩定 · 促進自主性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保護個人免於勞動市場與家庭變遷的風險 · 預防貧窮，提供必要的救濟 · 資源重分配 · 個人生命週期中的時間與財富資源重分配 · 促進社會凝聚 · 鼓勵個人獨立自主

資料來源：Jenson (2009)。

表 2 三種福利典範的比較

	凱因斯典範	新自由主義典範	社會投資典範
失業原因	需求不足	勞動市場的苛刻	缺乏適當技能
價值與原則	社會公平 去商品化	個人責任 活化工作	社會融合 更好的工作 增強能力 機會均等 準備取代修補
公共行動的規範	大政府 福利國家成長	小政府 解構福利國家	賦權的政府 重構福利國家
政策工具	需求的支持 保險 所得維繫	貨幣政策 去管制 私有化 工作福利	人力資本 促成就業彈性安全的 服務

資料來源：Morel, Palier & Palme (2012); Martignani (2016)。

前的新社會風險、性別角色和人口結構等議題，企圖建立一個新的福利社會典範。

貳、社會投資的三大支柱

社會投資的核心理念是社會政策不再是人們遭遇經濟的不幸時，政府藉由現

金給付「消極地」保護人民，而是平實的準備和賦予人民能力，好讓人民融入市場（Jenson & Saint-Martin, 2003）。社會投資的概念意含著一種強調經濟成長與就業的福利模式，其策略著重於活化勞動市場與人力資本投資以解決失業問題與傳統消費性的福利支出。社會投資以知識經濟為

基礎，認為每個人若缺乏知識與技能，將會是社會的新風險。社會投資觀點不同於以往的福利國家著重於所得重分配及案主的權益，而是更加重視透過人力資本的投資，使每個人都能增強能力，參與經濟活動。終身學習的策略用來強化人的適應能力與彈性，使人能持續參與經濟活動及社會融合。終身的機會與社會融合強調一輩子都能獲得教育與訓練，同時應有積極的勞動力市場與福利政策。除了經濟支持之外，政府在打擊社會排除所要扮演的角色是擴大就業與教育機會（Perkins, Nelms & Smyth, 2004）。基本上，社會投資策略的主要工具是強化人力資本和勞動市場參與的政策與社會支出（Ahn & Kim, 2015）。

就生命歷程的觀點來看，社會投資於每個人的不同生命階段中都有重要之任務要完成，社會投資政策就是協助所有人達成這些生命歷程中的任務，像是幼兒時期的照顧與教育、持續獲得更高的教育、完成學業後的就業、就業後的工作與家庭的平衡、提高女性就業率、降低父母生育子女數的期待落差、活躍的老年生活及預防整個生命歷程中的貧窮，如圖 1（Hemerijck, 2018）。

本質上，社會投資強調的是社會福利的生產性功能（productive function），其策略是在每個人各個階段的生命歷程中，發展、運用及保護人力資本，以確保個人、家庭和社會的福祉，並維繫經濟制度的競爭力。因此，社會投資政策具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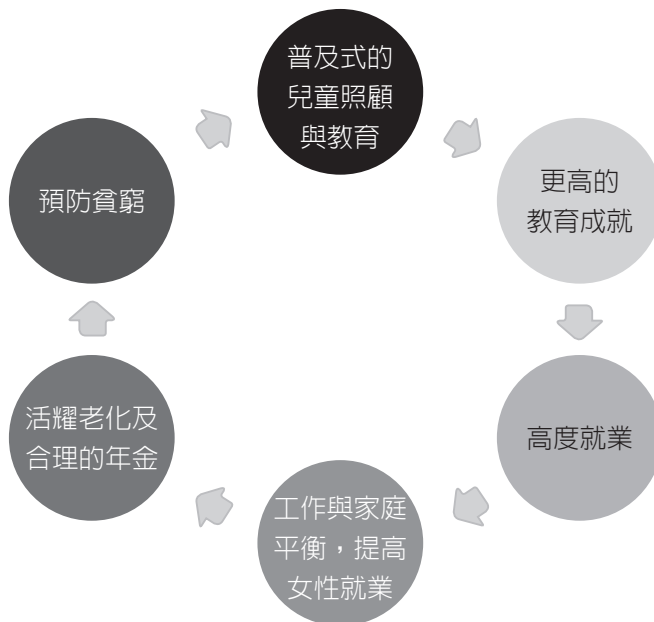


圖 1 社會投資與生命歷程

三種相互關係的特殊功能，一是在生命歷程中提升人力資本和能力的「儲存」（stock）；二是促成當代勞動力市場和生命歷程轉換的「流通」（flow）；三是維繫普及式的最低所得安全網，在高齡化社會中作為所得保障和經濟穩定的「緩衝」（buffer）（Hemerijck, 2017）（參閱圖2）。

「儲存」人力資本是要提升人的技術與能力，讓人在經濟市場中更具有生產力，特別是在人口老化、少子化、及女性就業率低的情狀下，社會將面臨嚴重的勞動人口短缺。所以人力資本的投資不僅要提升勞動參與率，也要培養每個人的就業能力，方能在全球化市場中具有競爭力。提升人力資本「儲存」品質的政策包含：幼兒教育與照顧（ECEC, Early Child Education and Care）、通識教育、

技職教育、大學生就業訓練、及終身學習（Hemerijck, 2017）。歐盟國家的社會投資訴求擴大投資於「人」（investment in people），將重點置於教育及人力資本的發展、促進終身學習、強化兒童早期介入、鼓勵積極參與勞動力市場等社會政策（Jenson & Saint-Martin, 2003）。人力資本的投資仍具有相當濃厚的工具性，為了是要維繫國家在全球市場中的競爭力，這項社會投資的功能在本質上仍是新自由主義的典範，人力資本投資被當成是一種手段，其最終的目的仍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性目的。

社會投資的「流通」功能在於有效運用勞動力資源，讓不同性別的人在不同的生命階段中都能盡力提高勞動參與，特別是讓那些剛離開學校的學生、失業者、父母（特別是女性）、老年人及身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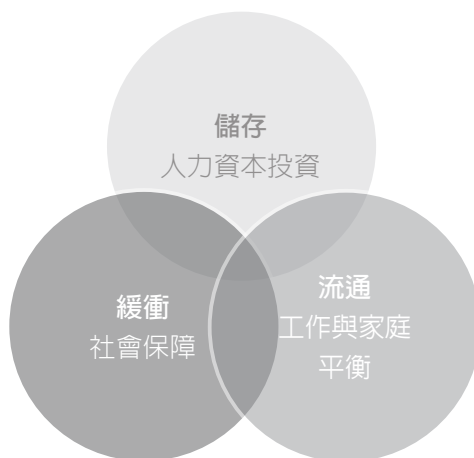


圖 2 社會投資的三大支柱

障礙者都能在就業協助下進入勞動力市場（Hemerijck, 2017）。「儲存」人力資本是要投資於準備進入勞動力市場的人；老人與身障者的照顧、兒童托育、和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則在鼓勵人們投入勞動力市場；失業保險、產假與育嬰假、和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則是在維繫勞動參與者的能力；老人年金、遺族年金、失能給付、失業救助、社會救助、失業保險、住宅津貼、健康照顧、疾病給付等則是針對退出勞動力市場的人給予補償（De Deken, 2014）。

「緩衝」的功能基本上是經濟發展的輔助功能，因為當個人或家庭獲得最低所得的保障，就較有可能投資人力資本以增強就業能力，如此可以「緩衝」社會不公的緊張與穩定經濟。而且適當的社會保障制度可避免個人與家庭陷於風險的惡性循環，以「緩衝」社會秩序的不穩定。在嬰幼兒時期若有社會保障，可讓兒童順利發展，將來成為好的就業公民（worker citizen）；青壯年時期若有最低工資的保障、失業給付、家庭照顧政策則有助於促進生產及鼓勵生育；老年階段若仍有最低薪資和年金給付不僅可讓老人持續在勞動市場，也可「緩衝」老人的經濟不安全（Hemerijck, 2017）。

社會投資的「儲存」、「流通」和「緩衝」三大功能彼此有交互作用，而且許多社會政策同時兼具兩項或三項上述功

能（De Deken, 2014; Hemerijck, 2015）。例如幼兒教育與照顧本身就具有「儲存」的功能，透過有品質的幼兒教育，提高未來勞動參與者的人力資本；幼兒教育與照顧也具備「流通」的功能，讓幼兒的照顧者能專心在勞動市場工作；同時幼兒教育與照顧也有「緩衝」的功能，幼兒的照顧者若持續參與勞動市場就能擁有所得保障，避免家庭和兒童淪於貧窮，減少國家的社會救助支出。

參、社會投資與社會平等的反思

一、社會投資與馬太效應

高品質的兒童照顧與教育，以及促進勞動力參與是社會投資的主要策略。其中，高品質的兒童照顧更是提升女性勞動參與率的重要因素。理論上，社會投資應對所有家庭提供高品質的服務，以利所有母親積極投入勞動力市場。事實上是否所有家庭都能獲得有品質的兒童照顧呢？特別是社會上的低所得或低技術能力的父母也能獲得相同品質的兒童照顧服務，並且具有公平的就業條件呢？

歐洲國家所提供的兒童照顧政策普遍具有馬太效應（Matthew effect），亦即政府的公共支出多數是有利於中產階級或上層階級，對弱勢階級反而是不利的（Bonoli & Liechti, 2018; Pavolini & Van Lancker, 2018）。Pavolini與Van Lancker

(2018) 的研究顯示，歐盟會員國家使用正式兒童照顧的比例有很大之差異，丹麥與盧森堡有近70%的家庭使用公共化的正式兒童照顧，這些國家的比例最高；法國、瑞典、葡萄牙與荷蘭約有50%的家庭使用正式兒童照顧；捷克與斯洛伐克最低，低於10%。但是高社經地位與低社經地位使用正式兒童照顧服務，只有丹麥與馬爾他無明顯差異，比利時、塞浦路斯、葡萄牙、盧森堡、愛爾蘭、法國等都是高社經地位家庭使用正式兒童照顧較多。因此，歐盟會員國的正式兒童照顧明顯具有馬太效應，而且這是常態現象而不是例外情形。造成正式兒童照顧的馬太效應之原因，主要是結構性限制所造成，亦即正式兒童照顧的普及性及供給力不足所形成。從社會投資的觀點來說，這是值得省思的事，也就是應透過兒童照顧政策提供既便利、高品質與成本適宜的正式兒童照顧，也可說需要更積極的社會投資策略。

積極的勞動市場政策也是社會投資的主要策略，是否也有馬太效應呢？Bonoli與Liechti (2018) 的研究從職業訓練、創業方案與薪資補貼三種方案探討低技術能力者與移民是否從方案中獲益？研究結果指出，職業訓練方案的參與者先前須具備某些認知與語言能力和具備適當的動機，所以職業訓練方案會產生馬太效應。低技術能力者不利於參與創業方案，移民幾乎很少參與創業方案。低技術能力者不利於

參與薪資補貼而就業，移民更加困難。因此，積極勞動市場政策對弱勢的低技術能力者與移民是不利的，可說具有馬太效應。Bonoli與Liechti進一步指出，社會民主體制福利國家的積極勞動市場政策對低技術能力者與移民較友善，對弱勢者的就業比保守體制福利國家更有幫助，馬太效應的影響較低。

社會投資觀點最常被批評的是，對於減緩貧窮的效果不彰，而且反而造成不公平。社會投資策略的兒童照顧所產生的馬太效應比積極勞動市場策略還要嚴重。不過，兒童教育與照顧產生的馬太效應，主要是供給面所造成的，亦即是政府的社會投資不足，對弱勢者及弱勢區域的投資不夠，讓資訊不對稱的弱勢者所能取得的資源相對缺乏 (Busemeyer et al., 2018)。反過來說，如果政府的投資充足，則馬太效應則可降低。而政府投資是否足夠又涉及政府意願的問題，保守主義福利體制的政府投資的意願低於社會民主主義的政府。所以，社會投資能否有成效仍取決政府的態度。

二、社會投資對性別平等的影響

前面Goodin等人論及傳統福利國家與社會投資型國家的社會價值比較時提到，社會投資觀點的價值似乎較不重視平等的議題，但許多社會投資的論述仍舊會強調社會投資與平等的關係，像是社會投資與

所得平等、性別平等與族群平等的關係。基本上，越是平等的社會推動社會投資政策的結果越容易成功。意即平等是社會投資策略成功的先決條件，因此傳統福利國家的社會保障體系和反貧窮政策仍是社會投資政策的重要議題（Morel, Palier & Palme, 2012）。

就歐盟國家而言，社會投資所產生的影響在性別平等的不同面向與各個區域有所不同。多數歐洲國家，男性少年與青年的教育成就不如女性少年與青年；女性在就業方面比男性遭遇更多的困難；女性雖然壽命較長，但身體不健康的年數也比男性長。北方的歐洲國家像是丹麥、德國與英國的社會投資政策比中歐、東歐與南歐的國家健全，受到社會投資政策影響的偏北方歐洲國家也比中歐、東歐與南歐的國家好。若是社會投資政策越能促成照顧公平分擔，就越能激發父親投資於子女身上，也會降低對婦女的就業歧視及照顧負荷，同時能縮短薪資、年金與健康的差距（Kvist, 2015）。

Esping-Andersen（2002）提倡「新性別契約」（new gender contract）支持新福利國家，也支持以兒童為核心的社會投資策略。他認為高度的女性勞動參與，是維繫新政治經濟穩定的必要條件；國家應該容許女性的生命歷程「男性化」，而同時也認為男性應該更具有女性化的生命歷程。後工業社會需要女性就業，也需要擔

心女性生育減少的風險，因此需要平衡女性的就業與母職，重要的政策工具是平衡非父母的兒童托育。針對學齡前兒童的照顧去家庭化，方能讓女性成功達成職涯與母職的雙重目標。

社會投資觀點也有其限制，最主要是社會投資觀點過度著重於勞動取向的社會政策，而忽略了健康和教育議題，這卻是福利國家重要的部分。社會投資觀點與公民權理論一樣，都強調提供資源以實踐機會平等是一種公共責任，當然也包括促進性別平等。但女性主義一直對於以兒童與人力資本為焦點的社會投資策略，是否能促成性別平等有所質疑。

第二個被忽略的問題是，同工同酬的議題。雖然社會投資觀點強調工作與家庭的平衡，但其目的多著眼於人口因素，提高生育率和老人照顧，而忽略女性與男性的薪資報酬落差。女性就業、工作與家庭平衡都是一種工具，主要是為投資於兒童，其次是避免人口老化的不良後果；女性的經濟自主看似是最不重要的目標。簡言之，這些社會投資政策多半是為了家庭，而不是為了女性（Jenson, 2015）。

社會投資觀點對挪威的就業與福利政策確實產生改變，性別平等的願景對本土的白人女性也逐步在實踐中，但對少數移民婦女而言，由於其教育程度與就業能力都比較低，理應是社會投資的主要標的（Midtbøen & Teigen, 2014）。但如同其

他歐洲國家一樣，移民少數族群整合勞動市場的程度仍低，這些人的失業率仍偏高（Morel, Palier & Palme, 2012）。

因此，將社會投資視為是性別平等的新思維，經常遭受女性主義的批判。女性主義批評社會投資的理念仍是建立在新自由主義的利潤、經濟成長與福利國家永續經營的前提下，而平等與正義只不過是個附屬品。福利政策改革的根本問題不在於性別平等，而是害怕女性的低生育率與低就業率造成經濟停滯（Midtbøen & Teigen, 2014）。

若單純從促進女性就業來說，社會投資觀點與性別平等的主張則是一致的。但是性別平等的概念不僅是勞動參與，故不應只關注女性就業能力的議題。在福利國家的脈絡裡，或許Nancy Fraser關於重分配與承認（redistribution-recognition）的論述，將更能貼近性別平等的理念。Fraser認為過去論述公平的議題著重於資源的重分配，但是當新自由主義與全球化造成所得差距擴大，我們不僅要關注重分配議題，更需要關心承認的問題。承認是一種「認同模式」（identity model），認同的形成來自於對話中的建構，是一種互相承認的過程。承認是人與人之間一種理想的互惠關係，雙方是平等且獨特的差異（Fraser, 2000）。所以，承認的範圍包含族群、政黨、職業與性別等的差異。在女性的就業與家庭的議題上，不僅需促成同

工同酬，照顧的議題更需要獲得承認。不論是支薪或不支薪的工作，其資源與所得必須要能性別平等，這種重分配的觀點，則是與社會投資觀點一致的。但是性別平等觀點會更進一步地認可女性傳統的工作，例如不支薪的照顧與家務工作，是有意義的貢獻，也是應獲得合理資源分配，這才是「承認的正義」（justice of recognition）。這一點是性別平等有別於社會投資觀點的地方。社會投資觀點看重支薪工作更甚於不支薪的工作，但是性別平等的理念認為不支薪的照顧工作是人類社會生存最重要的工作（Auth & Martinek, 2017; Robinson, 2015）。

換言之，社會投資觀點有可能無法促成性別平等，因為它過度著重在於如何讓女性進入職場，而沒有想要去改變男人在家庭的角色。因此社會投資觀點基本上只是在促成男性就業模式（male worker model），而不是促進就業暨照顧者模式（worker and carer model）。女性仍然是不支薪家庭工作的主要承擔者，在這種情況之下反而是貶抑所有那些不支薪的工作，這種人力資本模式事實上是沒有太大效用的（Saraceno, 2015）。雖然社會投資透過工作與家庭平衡、幼兒照顧和教育等策略來支持女性與兒童的「部份去家庭化」（partial defamilization），但還是未能突破女性是不支薪家庭工作的主要承擔者（Saraceno, 2017）。

其實性別平等不只是機會均等的議題，而且也要顧及結果的平等。因此社會投資策略仍無法忽視傳統福利國家的社會保障體系所強調的平等。Morel, Palier與Palme（2012）更指出社會投資不僅應重視平等的問題，更不能忽視品質的問題。如果弱勢族群無法得到有品質的教育、服務與工作，那只能從事較低技術或較低薪工作，即使是就業也是工作的窮人。因此光是活化（activation）勞動力市場是不夠的，更需要以社會投資策略，提升教育、服務與就業的品質方能實質促進性別與族群的平等。

肆、結語：哥白尼式的翻轉

雖然Hemerijck（2017）強調社會投資具有「儲存」、「流通」和「緩衝」三大功能，事實上多數的學者將兒童與家庭政策、教育和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列為最主要的社會投資政策，而比較忽略社會保障政策。有些人甚至主張社會保障政策與社會投資政策具有相互排擠作用，特別是在預算撙節的狀況下更加明顯。Giddens的第三條路主張以投資型福利國家取代傳統的社會保障，Esping-Andersen等人則舉證北歐國家的經驗反對Giddens的說法，他們認為社會投資和傳統的社會保障制度是不可分割的，而且所得安全是社會投資策略能夠發揮功效的先決條件（De Deken

2014; Esping-Andersen et al., 2002; Morel, Palier, & Palme 2012; Vandenbroucke & Bart Vanhercke, 2014）。

自從2013以來，社會投資觀點雖然是歐盟國家社會政策的理論基礎，但也遭受不少批評。2017年之後的歐盟也不再大張旗鼓標榜社會投資，而是回歸社會權的理念。歐盟執行委員會從2017年開始正式推動「歐洲社會權支柱」（The European Pillar of Social Rights），「歐洲社會權支柱」提出的20項原則可分為三大主題：一是機會均等與勞動市場，處理教育、訓練、終身學習、性別平等、機會平等、積極支持就業等；二是關於公平的工作條件，著重於就業的安全與彈性、薪資、就業條件的資訊、被解雇的措施、社會對話與員工參與、工作與生活平衡、健康、安全與工作環境適應、資訊保密等；第三個主題是社會保障與融合，關心的是對兒童的支持、社會保障、失業給付、最低所得、老年人的所得與年金、健康照顧、身障者的融合、長期照顧、住宅、街友服務、及基本的社會服務等（Maison Fontecha, 2017）。「歐洲社會權支柱」的三大類型基本上和Hemerijck社會投資的「儲存」、「流通」和「緩衝」三大功能相互呼應，似乎社會投資尚未走向終結之路，而是更加深化，更加重視社會投資與社會保障的均衡。

「歐洲社會權支柱」或社會投資策

略本質上仍是以新古典經濟學觀點為基礎的政策，是以社會政策為工具以輔助經濟成長。有學者認為，社會投資策略還是具有濃厚的新自由主義色彩（Ascoli, 2012; Barbier, 2012; Leibetseder, 2018）。社會投資反映了新自由主義的特徵，像是經濟與福利改革去政治化、用經濟法則去詮釋國家的運作、將經濟的邏輯擴充所有非經濟領域、將人力資本看成是人的核心等（Laruffa, 2018）。這種新古典經濟學的邏輯若不加以改變，過去社會投資所遭致的批評仍舊無法解決。當代社會已經面臨需要哥白尼式翻轉的時機，我們應該以人性尊嚴取代人力資本來看待人（Héjj, 2019）、以團結和相

互關係（reciprocity）取代競爭（Bruni, 2008）、以脆弱性的人性論取代自主性的人性觀（Bruni, 2017）、以規範性倫理的觀點取代實證主義的經濟學（Baiman, 2016; Rona & Zsolnai, 2017; Setter & Zsolnai, 2019）。特別是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之後，我們更應該體認到人類生存最根本問題是照顧（care）議題，如何建構一個公平與民主的照顧體系才是人類追求幸福（eudaimonia）的目標。

（本文作者為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關鍵詞：社會投資、社會保障、社會權

參考文獻

- Agostini, C. and D. Natali (2015). The EU's ambivalent involvement in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olicies. In D. Natale & B. Vanhercke eds.. *Social Policy in the European Union: State of Play 2015*, pp. 153-182. Brussels: Europe Trade Union Institute.
- Ahn, S. H. & S. W. Kim (2015). Social investment, social service and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welfare stat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ocial Welfare*, 24, 109-119.
- Ascoli, U. (2012). Comment on Anton Hemerijck/1. Retrenchment policies and the deficit of social europe. *Sociologica*, (1). doi: 10.2383/36888.
- Auth, D. & H. Martinek (2017). Social investment or gender equality? Aims, instrument, and outcomes of parental leave regulations in Germany and Sweden. In D. Auth, J. Hergenhan & B. Holland-Cunz eds.. *Gender and Family in European Economic Policy: Developments in the New Millennium*, pp. 153-176.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Baiman, R. P. (2016). *The morality of radical economics ghost curve ideology and the value neutral aspect of neoclassical economic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Barbier, J. C. (2012). Comment on Anton Hemerijck/2. Social investment, a problematic concept with an ambiguous past. *Sociologica*, (1). doi: 10.2383/36889.
- Bonoli, G. & F. Liechti (2018). Good intentions and Matthew effects: Access biases in participation in active labour market policies.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25(6), 894-911.
- Bruni, L. (2008). *Reciprocity, altruism and the civil society: In praise of heterogeneity*. New York: Routledge.
- Bruni, L. (2017). Economics and vulnerability: Relationships, incentives, meritocracy. In P. Rona & L. Zsolnai eds.. *Economics as a Moral Science*, pp. 107-128. Cham: Springer.
- Bussemeyer, M. R., de la Porte, C., Garritzmman, J. L. & Pavolini, E. (2018). The future of the social investment state: politics, policies, and outcomes.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25(6), 801-809. doi:10.1080/13501763.2017.1402944.
- De Deken, J. (2014). Identifying the skeleton of the social investment state: Defining and measuring patterns of social policy change on the basis of expenditure data. In B. Cantillon, & F. Vandenbroucke eds.. *Reconciling Work and Poverty Reduction: How Successful are European Welfare States?* pp. 260-28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räbing, V. (2013). *Welfare transformation and work and family reconciliation: What role for social investment in European welfare states?* NEUJOBS Policy Brief No. D5.6.
- Esping-Andersen, G. (1990).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Esping-Andersen, G. (2002). Toward the good society, once again? In G. Esping-Andersen, D. Gallie, A. Hemerijck & J. Myles eds. (2002). *Why we need a new welfare state*, pp. 1-2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Esping-Andersen, G. (2009). *Incomplete revolution: Adapting welfare states to women's new rol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Esping-Andersen, G., D. Gallie, A. Hemerijck & J. Myles eds. (2002). *Why we need a new welfare stat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raser, N. (2000). Rethinking recognition. *New Left Review*, 3, 107-120.
- Giddens, A. (1998). *The third way. The renewal of social democrac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Goodin, R. et al. (1999). *The real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éjj, T. (2019). Dignity, love and servant-leadership. In O. Setter & L. Zsolnai eds.. *Caring Management in the New Economy*, pp. 139-162.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Hemerijck, A. (2015). The quiet paradigm revolution of social investment. *Soci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Gender, State & Society*, 22(2), 242-256. doi:10.1093/sp/jxv009.

- Hemerijck, A. (2016). New EMU governance: Not(yet)ready for social investment? Working Papers of the Vienna Institute for European integration research (EIF)1, Institute for European integration research(EIF).
- Hemerijck, A. (2017). Social investment and its critics. In A. Hemerijck eds.. *The Uses of Social Investment*, pp. 3-3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emerijck, A. (2018). Social investment as a policy paradigm.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25(6), 810-827.
- Jenson, J. & D. Saint-Martin(2003). New routes to social cohesion? Citizenship and the social investment state.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8(1), 77-99.
- Jenson, J. (2009). Lost in translation: The social investment perspective and gender equality. *Soci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Gender, State & Society*, 16(4), 446-483.
- Jenson, J. (2012). Redesigning citizenship regimes after neoliberalism: Moving towards social investment. In N. Morel, B. Palier & J. Palme eds.. *Towards a Social Investment Welfare State? Ideas, Policies and Challenges*, pp.61-88. Bristol: The Policy Press.
- Kvist, J. (2015). A framework for social investment strategies: Integrating generational, life course and gender perspectives in the EU social investment strategies. *Comparative European Politics*, 13(1), 131-149.
- Laruffa, F. (2018). Social investment: Diffusing ideas for redesigning citizenship after neo-liberalism? *Critical Social Policy*, 38(4), 699-706. doi:10.1177/0261018317749438.
- Leibetseder, B. (2018). Social investment policie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Swimming against the neoliberal tide? *Comparative European Politics*, 16, 581-601. <https://doi.org/10.1057/s41295-016-0086-2>.
- Lundvall, B. Å. & E. Lorenz,(2012). Social investment in the globalising learning economy: A European perspective. In N. Morel, B. Palier & J. Palme eds.. *Towards a Social Investment Welfare State? Ideas, Policies and Challenges*, pp. 235-257. Bristol: The Policy Press.
- Maiso Fontecha, L. (2017). The European Pillar of Social Rights. *ERA Forum* 18, 149-153. <https://doi.org/10.1007/s12027-017-0473-4>.
- Martignani, L. (2016). New risks and reframing of local welfare as social investment: The case of the FORJAD Program in Switzerland', *Ope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6, 10-18.
- Midgley, J. & M. Sherraden(2009). The social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in social policy. In J. Midgley & M. Livermore eds.. *The Handbook of Social Policy*. Thousand Oaks: Sage.
- Midgley, J. (1999). Growth, redistribution and welfare: Towards social investment. *Social Service Review*, 77(1), 97-121.

- Midtbøen, A. H. & M. Teigen(2014). Social investment in gender equality? Changing perspectives on work and welfare in Norway. *NORA: Nordic Journal of Feminist and Gender Research*, 22(4), 267-282.
- Morel, N., B. Palier & J. Palme(2012). Social investment: A paradigm in search of a new economic model and political mobilization. In N. Morel, B. Palier & J. Palme (eds.). *Towards a Social Investment Welfare State? Ideas, Policies and Challenges*, pp. 353-376. Bristol: The Policy Press.
- Natali, D., B. Vanhercke & R. Johnson(2015). Introduction, the EU and the social legacy of the crisis: Piecemeal adjustment or room for a paradigm shift? In D. Natale & B. Vanhercke eds.. *Social Policy in the European Union: State of Play 2015*, pp. 13-31. Brussels: Europe Trade Union Institute.
- Pavolini, E. & W. Van Lancker(2018). The Matthew effect in childcare use: A matter of policies or preferences.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25(6), 878-893.
- Perkins, D., L. Nelms & P. Smyth(2004). Beyond neo-liberalism: The social investment state? *Social Policy Working Paper No. 3*, The Centre for Public Policy,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 Robinson, F. (2015). Care ethics, political theory, and the future of feminism. In D. Engster & M. Hamington eds.. *Care Ethics & Political Theory*, pp. 293-31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ona P. & L. Zsolnai eds. (2017). *Economics as a Moral Science*. Cham: Springer.
- Saraceno, C. (2015). A critical look to the social investment approach from a gender perspective. *Soci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Gender, State & Society*, 22(2), 257-269.
- Saraceno, C. (2017). Family relationships and gender equality in the social Investment discourse: An overly reductive view? In A. Hemerijck eds.. *The Use of Social Investment*, pp.59-6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etter O. & L. Zsolnai eds. (2019). *Caring management in the new econom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Tilton T. (1993). The role of ideology in social democratic politics. In K. Misgeld, K. Molin & K. Amark eds.. *Creating Social Democracy: A Century of the Social Democratic Labor Party in Sweden*, pp. 409-427.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